

父亲殉国之后

阚培桐

父亲于1944年冬在桂林阵亡。那年我才五岁，全家从柳州乘船到融县，再随逃难的人流徒步走到罗城龙岸乡，记得是二哥培椿用箩筐挑着我，箩筐的另一头装着行李和雨伞。途中我的颈上生疮流脓，找了个乡村医生要些膏药敷贴，结果颈上留下了疮疤。

抗战期间我家在桂林的房屋被日本飞机炸毁。我们于光复后返回柳州祖居，和叔伯婶母们共同住在中山东路阚家旧宅。哥哥姐姐都在上学读书，生活比以前艰苦多了。母亲和哥哥把我送入文惠小学，该校邓凡平校长体谅我们的困难，同意我的学费减半。这所小学教学质量很高，我在这里学了不少抗战歌曲，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邓校长亲自给我们上语文和算术课。他的课讲得好极了，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柳州解放前，大哥培松已从国立广西大学电机系毕业，到柳州电厂工作。国民党撤退时，准备炸毁电厂，大哥积极参加护厂工作，后来由入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签署命令，为他记大功一次并晋升一级。他不久便响应国家的号召，支援东北建设，远赴沈阳工作；二哥培椿当时是青岛海军军官学校的学员，解放前随校迁往台湾，以后便杳无音讯；姐姐培荪解放后就读于广西大学农学院，后转北京辅仁大学；家中只剩下我和母亲。在第一任市长魏伯和副市长高

天骥的关怀下，柳州市军管会发给我们光荣匾，街道居委会逢年过节也常来慰问。

父亲阵亡后，我们的生活来源发生困难，依靠各方资助维持到柳州解放，此后即依靠大哥一个人的工资收入维持家庭生活。1951年我随母亲迁居桂林，次年又迁往沈阳与大哥共同生活，我在那里读完了中学和大学。1965年大学毕业后，大哥鼓励我响应祖国号召支援边疆建设，我三次提出申请要求前往北大荒，最后获得批准。同年秋季，我告别母亲和大哥，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我们全家同时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那时母亲和大哥在沈阳，姐姐在柳州，我在北大荒。我们均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除台湾的二哥外，包括家中所有亲属均无一幸免。我一直珍藏着的一本父亲送的小册子，也被作为罪证抄走。这是一本精致的小笔记本，全由父亲用工整的字体书写。封面写着“桐桐的小书”，首页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二页是“中国人好，日本兵坏”，其后就是教育我热爱祖国，尊敬父母师长，遵守社会公德以及讲卫生等内容。虽然当时被抄走的东西不计其数，但最使我伤心的就是这件父亲留给我的唯一礼物。

抗战胜利后，由广西各界上层人士主持在桂林召开了公祭大会，在七星岩普陀山腰（七星岩霸王坪）修建了抗日阵亡三将军及八百壮士墓园，墓前修建了殉职纪念塔和纪忠亭，在桂林东镇路我家旧居（战斗时亦作为师指挥部）亦修建了殉职纪念塔。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和罗铁青分别题赠了石刻，蒋所题为“英风壮节”，李所题为“浩气长存”，白所题为“英灵永峙”，罗所题为“流芳千古”。文化革命期间，这些建筑均被红卫兵捣毁，四块石刻也不知去向，直到

1982年下半年，才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拨出专款，对三将军墓、八百壮士墓及纪忠亭进行了修复，并于1984年10月将墓地列为桂林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墓地进行管理和逐步修缮，以供游人观览和瞻仰。失散多年的四块石刻中的三块，也由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桂林市饮料厂的协助下找回，陈列于墓侧。其中蒋介石题赠的一块至今仍未找到。1987年10月又由桂林市拨出专款将三将军墓前的殉职纪念塔进行了重建。如今每逢清明时节以及游览季节，墓地游人络绎不绝，墓前花圈纷陈，成为一处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

我于1976年春将母亲由沈阳接往北大荒同住，但母亲年事已高，不适应那里的高寒气候和艰苦条件，旋于次年夏季将她送回柳州，暂住拉堡，由我外甥女阚利文代为照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拨乱反正和各项政策的逐步落实，我家各人均相继获得平反并得到政府的妥善安排和多方照顾。母亲在柳州市有关部门的关心和安排下于1981年底迁回市内定居并由政府安排了住房，1982年3月30日的柳州日报为此曾以“罗詠裳老人喜迁新居”为题进行过报道；姐姐于198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并由组织协助安排在自治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任教；为照顾母亲的晚年生活，在柳州市委统战部的协助下，我于1982年底由北大荒调来柳州市工作，在自行车总厂任工程师和科长，并于1983年由谢凤年先生介绍加入民革组织。

1983年春季，大哥由沈阳返回柳州探亲，我们一家以及亲友共计二十余人在当时柳州市对台办公室副主任覃岭和民革柳州市委会副主委谢凤年等人的陪同下，首次前往桂林祭奠抗日阵亡三将军及八百壮士，受到桂林市委统战部、市政协以及民革桂林市委会的热情接待。

1984年11月，经自治区民政厅上报，由国家民政部审批，追认我父亲为革命烈士，同月由柳州市人民政府在市政协礼堂召开颁发阚维雍烈士证书大会，向我们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随后在民革柳州市委会的主持下召开了缅怀阚维雍烈士座谈会，会上由烈士遗属、亲友及旧部多人发言，回顾追述了烈士光辉的一生及其英雄事迹。

为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以励后人，自治区民政厅、柳州市民政局以及市志办和档案局等部门和单位曾多方收集我父遗信遗物及有关历史资料。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博物馆自1983年起即多次派人远赴沈阳和柳州南宁等地征集我父遗信遗物，由于我们的大力协助和积极捐赠，桂林市博物馆为此曾于1985年7月向我颁发了奖状和奖金。

为追忆我父生平和桂林作战情况，他的旧部以及众亲友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历年出版的广西以及桂林柳州梧州文史资料中多有刊载；近年在全国出版发行的《抗日战争国民党抗日阵亡将领录》和《中国抗日阵亡烈士传》中亦收录有我父事迹；中央以及一些省市的十余种报刊杂志如《人民日报》、《团结报》、《人民政协报》、《支部生活》、《南方文学》等亦均曾作过有关报道；姐姐培荪以及当年131师391团团长覃泽文还先后于1984和1985年在美国旧金山《时代报》发表过悼念文章；台湾出版的《广西文献》也刊有我父旧部撰写的数篇文稿；台湾的忠烈祠也收集保存着我父亲的一些历史资料。

1990年8月4日柳州市政协、民革、黄埔同学会柳州小组联合隆重召开“纪念阚维雍将军诞辰90周年”座谈会。

岁月匆匆，抗日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转眼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当年的青年和儿童，如今已迈入老年和壮年。母亲

于1984年病故，终年82岁；大哥培松在沈阳工作四十年，多次获得嘉奖，还曾进北京出席过劳模大会，如今已退休；二哥培椿在台湾与我们多年失却联系，在香港和美国亲友的帮助下，我们于1981年同他恢复了通信；姐姐培荪退休后定居南宁；我于1985年调入广西电大柳州分校任教，并自1983年起相继被推选为自治区政协委员、鱼峰区人大代表、柳州市人大代表及民革柳州市委委员和常委，还先后两次赴北京出席民革中央全国代表大会。

父亲殉国四十多年了，他爱国的英雄业迹和坚贞的民族气节，永远深藏于我的记忆之中，他留给我们的主要不是悲痛，而是激励与鞭策。

（作者：阚维雍三儿子，现任广西电视大学柳州分校教师，工程师）